

【论 文】

《他者中的华人》译后记

李明欢¹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先后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专著，都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翻译成中文而广泛传习。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从业已驾轻就熟的清史领域转而致力于海外华人史研究，此举一时引起许多中国同行的惊诧，因为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处于没有明确学科归属的边缘地位。孔教授自己曾经向不少人说起过他 2001 年应邀访问中国社科院时的一段小插曲。当社科院同行询问孔教授近期的研究题目时，孔教授答曰：“海外华人，中国移民史。”谁曾想面对如此答复，一时竟无人应对，过了好一会，才有一人答曰：“啊，这个问题很重要，他们以前给孙中山很大的支持，给他很多钱……”国内学界对于“海外华人研究”的狭隘视界，给孔教授留下深刻印象，也更促使他在那以后的许多场合，反复重申他对“海外华人研究”之意义的认识与评价。

2008 年，在历经十余年的潜心研究之后，孔教授推出了集大成之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下简称《他者中的华人》）。2009 年，我得到该书，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一位史学大家在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为一体之宏观大视野下对海外华人历史所做深刻解读，令我有眼前一亮之感，当时就有一股希望将此书译成中文的冲动。然而，因为杂务缠身，终究未能着手，故而只是将自己仔细阅读之后的感悟，撰写了中、英文两篇书评，分别发表于北京的《读书》杂志（2009 年第 8 期）和新加坡的英文杂志《海外华人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09 年，总第 5 卷）。

2014 年，当我正式从厦门大学退休之后，当年的心愿再次浮上心头，尤其是在听说孔教授身体欠佳的消息之后，更感到应当尽一己之力，将他的这部著作译介给中国的更多读者。如此心愿有幸得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编辑的鼎力支持，他不仅妥善解决了版权问题，而且给予我充分的信任，由此，译介孔教授大作的意向有了坚实的根基，从而也有了非完成不可的动力，以及非做好不可的压力。

毋庸讳言，翻译学术大家的著作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虽然本人因为研习海外华人历史近 30 年，对于孔教授在书中提及的主要历史脉络和众多侨史名人不可谓不熟悉，这正是我在一开始就对翻译此书信心满满的缘故，然而，真正着手翻译，才发现越译越难。因为，无论是对孔教授所提出的一些新颖观念的理解，或是对若干专用术语的跨文化表述，更不用说对书中所援引的大量原始资料的查校，无不充满未曾预想到的挑战，因此，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估量和计划。不过，当在电脑上为译稿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心中的喜悦即刻冲刷了此前的一切辛劳与疲惫。决不敢说译稿尽善尽美，但绝对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对每一句每一段的翻译都不敢有丝毫懈怠，耳边时刻长鸣着译文务必对得住孔教授之声誉的警钟。

外子黄鸣奋为本书担任了校译。虽然他不直接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但是，他曾经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对于跨文化话语的对译与沟通有独到心得，加之他的严格与严谨，认

¹ 作者为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特聘教授。



真真地承担起了精准传递孔教授原著精神之把关人的职责。

翻译的过程也是再度深刻理解孔教授之思想的过程。如今，当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之时，回首再读6年前撰写的书评，不免感觉尚有言之未尽、解之未当之处。如下，是我在6年前草撰书评的基础之上，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对孔教授大作的再理解。谨此录之于下，诚恳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安土重迁”的新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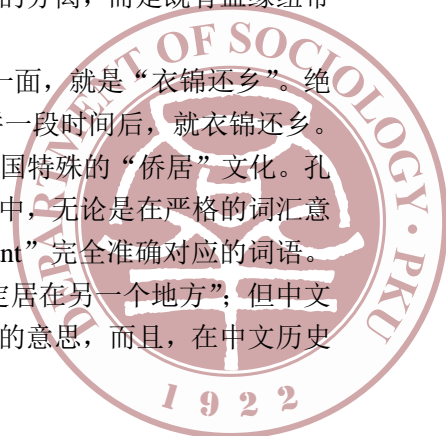
根据孔教授的界定，本书在时段上囊括的是中国海外移民历史的“现代篇”（modern times）：其上限，始于1567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其下限，终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跨国跨境移民潮。孔教授对于近500年来中国人口向海外迁移历史的梳理，充分展现出其把握社会发展大历史的匠心独运。虽然此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人，但是，其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却与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密切相关。其中，对于“安土重迁”的重新解读，即为一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性，许多外国学者亦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一说法。然而，孔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置疑，并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实指出，虽然明清时期曾多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施“海禁”，但是，这一政策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全面有效实施。无论当时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险冲破禁忌的沿海普通民众需要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中获取实际利益，而执政沿海的地方官吏们由基于当下本乡本土的利益，或对违禁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或打着执行禁令的旗号，向底层民众索贿受贿，强征豪夺。由此可见，“移民”或曰“流动”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战略，民众的基本需求从来就不可能通过源自中央最高部门的一纸政令而完全阻止；而从中央到地方的科层体制中各级官员之间为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同样贯穿着最高政令从制定、下达到真正付诸实施之始终。的确，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性迁移，或是出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地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地向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的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带来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所具有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它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孔教授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做了有趣的剖析。孔教授指出，在中文当中，无论是在严格的词汇意义上，或是从百姓的日常口语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emigrant”完全准确对应的词语。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从自己的所在地迁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个地方”；但中文“移民”的语义虽然指人的流动，却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而且，在中文历史



典籍中，“移民”还包含英文中所没有的“依照国家命令迁移人口”的含义。时至今日，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和理念，形成了华侨、华人、华裔等由海外移民派生的系列名词，且各有其约定俗成的特定意义，如：“华侨”特指定居外国但仍保持中国国籍者；“华人”系指已经入籍他国的华人；“华裔”特指那些在外国出生的具有华人血统者；“侨眷”是华侨、华人在国内的眷属；而“归侨”则指回国定居的华侨，也包括回国定居后恢复中国国籍的华人。中英文语义上的不同，恰恰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折射。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联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初级群体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连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由此，“安土重迁”与“迁移发展”这一对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着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对立的统一。

二、与“他者”的互动

始终将中国海外移民的大历史，置于和移民地“他者”群体的互动中进行解读，是孔飞力研究的又一特色。

当今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但本人并不具华裔血统的杰出学者，屈指可数，仅就此而言，孔教授研究本身所展现的，就是以族群意义上“他者”的眼光对海外华人社会进行解读。恰如孔教授所指出的：如果不了解海外华人身边那些非华人的文化传统，就难以理解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也难以理解海外华人的所作所为，因此，研究海外华人，务必关注华人周边的“他者”，并公正反映他们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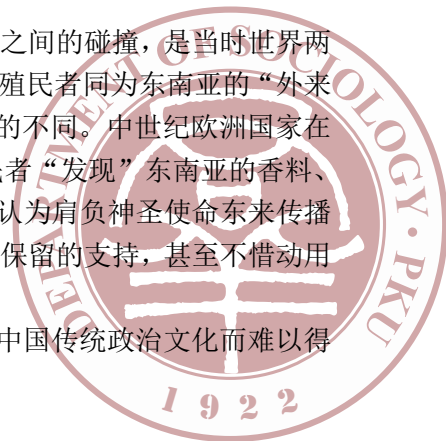
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其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

且以该书对东南亚华人历史的剖析为例。

在当今大约 5000 万海外华侨华人中，大约 80% 生活在东南亚地区。换言之，东南亚华人一直是海外华人的主体，而且，近百年来在东南亚国家屡屡出现的各类抑华政策乃至排华事件，也一直是各国学人的研究热点。孔教授的大作，同样对东南亚华人社会投以特别关注，虽然没有揭示多少新鲜史料，却以宏观大视野下提炼出的观点而耐人寻味。

在孔教授的笔下，历史上西方殖民者东来与大批中国移民下南洋之间的碰撞，是当时世界两大文明在东南亚的因缘际会。孔教授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移民与西方殖民者同为东南亚的“外来者”，但欧洲殖民势力的海上扩张与中华文明的海外拓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世纪欧洲国家在连年征战中业已形成了对武力拓荒的制度性支持，因此，当欧洲殖民者“发现”东南亚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瓷器能够在欧洲市场上获取暴利时，当欧洲的传教士们自认为肩负神圣使命东来传播基督文明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得到充斥着贪婪欲望之母国政府无保留的支持，甚至不惜动用舰船枪炮为其扫除障碍。

反之，历史上中国底层民众跨洋谋生，筚路蓝缕，却因为悖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难以得



到封建政权的认可，更遑论支持。在中华封建帝国晚期，中国内部经济、社会的系列变迁，虽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从务实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曾经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下的中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问题，但一直在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三大因素的制约下，左右踌躇。因此，当权者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政策实施，与海外移民所具有的社会能动性之间的博弈，贯穿了中国人 500 年海外移民历程之始终。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期，大量中国移民进入东南亚，与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需求相关。一方面，殖民者雇佣了大量华人劳工为其在东南亚各地开矿拓荒建立种植园；另一方面，殖民者还在以下三个领域显现出对当地华人的“特殊需求”或曰“特殊利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充当殖民当局向当地人敛财的代理；成为殖民时代城市化发展的人力资源。据孔教授的分析，东南亚华人如此特殊“功能”的形成，主要有如下三大原因。其一，在殖民者眼中，华人和西方人一样都是在“他者”的社会中生活，既与当地人无直接瓜葛，亦无乡土根基，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二，与西方殖民者相比，华人就群体而言，在东南亚生活历史较长，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比殖民者深广得多，而且，华人从相貌到文化均与当地人更有相近相通之处；其三，受华人传统文化影响，他们盼望的是衣锦还乡，因此大多没有在当地国从政的野心，故而令殖民统治当局感到“放心”。因此，当殖民者以武力成为东南亚的主宰后，为了固化其统治，就利用华人充当统治者与当地之间的中介，华人因而成为殖民者雇佣承包商、收税人的首选。尤其是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置当地华人于欧洲人之下、原住民之上，布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

虽然真正成为殖民者御用工具的华人并不多，通过此道而得以被接纳入殖民体系并大富大贵者更少，但是，由于华人处于殖民统治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作为代理人而首当其冲，因此，殖民者基于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选择，客观上导致当地民众形成了“华人乃殖民同伙”的刻板印象。在东南亚独立后尤其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基于族群基础而建构的此类社会刻板印象被无限延伸与扩张，故而成为排华事件此伏彼起的潜在动因。

以史为鉴，孔教授进而指出，东南亚独立后当地社会反反复复出现的各种“华人问题”，就本质而言，是东南亚国家的本土问题。虽然战后新独立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与共产党中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排华事件并不仅仅是当地民族政权将华人当成共产党中国的替罪羊。反之，那是由于独立后东南亚民族国家满怀民族主义理想的社会精英们，内心深处仍然不自觉地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去审视本国华人，认为那是一个曾经推动了殖民社会经济车轮运行的族群，由此，在弘扬本国民族利益至上的时代，对曾为殖民帮凶之华人族群的排斥、挤压乃至打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因为被置于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对普通民众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其影响不容低估。

将华人社会地位置于大历史进程中，并从“他者”的角度进行解读，其结论发人深思。

三、“通道—小生境”模式

倘若将本书与孔教授享誉学术圈的《叫魂》一书相比较，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手法上的改变。前者以小见大，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原始档案中挖掘资料，从深入剖析个案入手，解读大历史；而《他者中的华人》则是在对前人资料成果进行重新梳理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构架，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即为中国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

孔教授指出，纵观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数百年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此类“通道”并非如丝绸之路那样显现于现实的地理空间，而是经由潜在的亲缘乡缘之关系网络编织而成。“通道”的构成元素一是实质性的，即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二是虚拟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来往于移入地与移出地，为移民传递家书钱款的个体“水客”和体制性的“侨批局”，是通道

的实际载体；而到了信息发达的今日，从电报、电话、传真到电子网络等无所不在的通讯体系，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便捷，使得通道运作更为通畅，功能也更加多元。

与“通道”相辅相成的，是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那是一个保持中国移民社群文化特色的生态圈：既可能是相对集中的商贸经营区或行业圈，也可能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建立的庙堂宗祠、社团学校；既可能是实体性的，形成于现实空间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潜在的，可以在需要时组织动员群体力量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网络。

“小生境”在移出地的体现就是独具特色的“侨乡”。背井离乡者的乡土情怀及现实利益导向，促使他们在异乡谋生时，谨守寄钱回家建房购地、赡养家人之天职。一旦有所积蓄时，往往就会通过向家乡捐赠善款，扶危济贫，建庙立祠提高自己的声名，而且，历史上还不乏海外侨亲资助家乡地方武装以“保卫家园”的记载。在政治上，谋生他乡的“成功者”，更是通过买官鬻爵，与故乡之文人、官僚汇聚一起，形成享誉一方的精英群体，参与到地方治理当中。传统的影响延绵不绝。由此，与跨国迁移相关的侨民、侨亲、侨眷、侨汇、侨房、侨官、侨务、侨委乃至当代从村、乡、县、省到全国层层建立的群团组织如“侨联”等，构成侨乡社会生态的基本元素，通过潜移默化而融入到当地普通百姓的行为举止习俗之中。

孔教授认为，在本书所探讨的中国现代史时期，以“通道一小生境”为标志的移民文化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业已呈现出制度性建构，其表征主要有四。其一，迁移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劳动力就会通过空间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员、金钱、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经民间通道循环往复，以移民文化为标志的利益共同体业已形成。其三，移民社群深受商业文化熏陶，经商意识超越社会阶级界线传播，并且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移民谋生异域的技能。其四，移民在异地建立的乡缘会馆，方言社团，业缘行会，以及从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庙宇、宗祠等，成为移民制度构成的文化元素，由此在中国国内南下移民聚居的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形成如马赛克般的方言习俗、民间信仰和人口结构板块，凸显了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移民地的特殊性，随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进一步向国外流动的主要发源地。当如此移民“通道一小生境”发展成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后，移民就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生态，因此，必须始终将通道的两端作为相互关联的部分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理解移民的动力、机制及认同特征，理解侨乡社会的经济文化取向。

孔教授的分析还指出，当客观环境有利于移民流动时，移民通道两端的人员、资金、文化相互交流，不断强化移民群体从原居地带到移入地的文化族群认同。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不利因素也可能制约乃至破坏“通道一小生境”模式，例如，当原居国或目的国政府建立起了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的人为障碍时，就可能阻隔通道的正常流通；又如，如果没有新移民进入，而在移居地出生成长之新一代又因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当中而对祖籍地一无所知，那么，“通道一小生境”就无以为继。

可是，孔教授同时也注意到，尽管上述不利因素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中国移民的“通道一小生境”模式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究其原因，孔教授特援引香港大学柯群英（Khun Eng Kuah）的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柯群英在《重建侨乡：新加坡人在中国》（*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一书中，以从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的柯氏宗亲群体为例，为我们生动描述了一个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海外移民重建侨乡认同的典型事例。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阻隔了侨情通道，因此，在新加坡成长的新一代华裔不少已经淡漠了对于祖籍地的认知。然而，当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与东南亚正常交往的大门之后，新加坡老一代柯氏族人即刻行动起来，推动并引领新加坡的华裔柯氏新一代踏上了返乡寻根问祖的归途。在与家乡实现互助共赢的利益导向下，侨乡

记忆被重新唤醒，侨乡纽带被重新延续，侨乡认同也在新形势下被大力重构。据此，孔教授指出：“通道一小生境”模式并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代移民的权宜之计，而是沉淀为一种代代传承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跨时代的韧性，具有通过内在动力实现重生与自我完善的特性，并且在当今时代更彰显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博弈中的特殊意义。

四、移民边缘性的杠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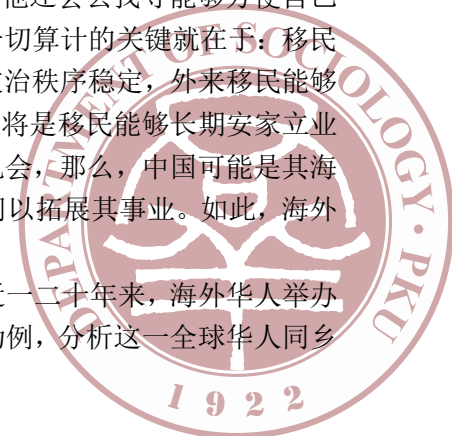
我在1999年出版的英文专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We Need Two Worlds)一书中，提出了跨国移民领域的“两个世界”理论，认为：对于第一代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移入地和原籍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每日需要面对、但始终感觉是一个陌生的“他者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存在空间距离、但在他们想象中却总是充满亲情温馨、近在咫尺的属于“我的”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是为了实现个人和家庭的上向流动(upward mobility)而迁移到了一个“他者”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所承受的一切，都需要源自“我的”世界的激励，无论这种激励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而且，他们在“他者”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也都需要、或期待能够在“我的”世界中得到认可乃至褒扬。唯有如此，他们才会感受到自身实现了社会上向流动的成就感。

孔教授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的第八章中引介了我的以上观点，认为：海外华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自己能够横跨两个世界的特殊地位中，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两个世界的理论阐述的是移民如何在其祖籍国和移入国之间，了解两国差异，利用两国差异的协同运作系统”。而且，孔教授还进一步指出，移民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跨国移民特殊“边缘性”特征的显示，而移民边缘性的特殊意义，则体现在移民如何有效利用其“边缘性的杠杆作用”。

孔教授认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已经不再因为血缘、乡缘纽带而成其为他们祖籍国天然的组成部分，因为，移民在适应不同所在国现实环境的过程中，已经并且还将不断形成、凸显各自的差异，因此，研究海外华人问题，务必对此演化趋势给予充分重视。众多跨国移民，无论是华人还是其他民族，他们的确身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政体制度的边缘，对此，虽有无奈，但亦有追求。换言之，身处边缘，尽管有种种不便与难处，然而，正是这一特殊性，却能够给予那些具有雄心抱负的移民以极其宝贵的特殊机遇。

孔教授详细剖析了跨国移民如何得以利用其边缘性去撬动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杠杆的主客观条件。他指出，虽然有的移民可能是随波逐流地去了某个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国度，但大多数移民在选择迁徙目的地的时候，一般都会考虑到经济机会，生活环境，中介路径，以及政治氛围等多方因素。移民在进入新的移居地之后，必然会想方设法在他者的环境中尽可能地找到自己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并着手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优势，以谋求生存发展。孔教授的研究表明：就中国移民而言，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会依托来自中国某一特定侨乡的地缘优势，或利用所具有的血缘亲缘优势，将自己在移入地社会中能够抓住的机会发挥到极致。而且，他还会去寻找能够方便自己从居住国去和自己的祖籍国打交道的路径。孔教授认为：“所有这一切算计的关键就在于：移民如何利用不同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和差异。如果，移民的定居国政治秩序稳定，外来移民能够被一视同仁，当地有良好的学校教育，人民享受旅行自由，那么，这将是移民能够长期安家立业的好地方。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呈现诸多投资获益的机会，那么，中国可能是其海外移民投资的理想地，甚至海外移民也可能往来于居住地与中国之间以拓展其事业。如此，海外移民就可能从身处两个世界之中谋获最大效益。”

孔教授在书中特别列举了海外华人大型跨国联谊活动的事例。近一二十年来，海外华人举办了诸多大型的国际性联谊活动，孔教授在书中以“世界华商大会”为例，分析这一全球华人同乡



历年的联谊聚会，如何得以相继吸引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会议主办者所在国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前去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孔教授认为：此类华人社团的国际性大会，并非仅仅是参与者个人的情感之旅，“可以说，这是在世界性的层级上将华人的边缘性用作杠杆，借以强化华人少数族裔在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更深刻地揭示了华人社团跨国联谊的真正意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孔教授本人及其家族成员游走于不同国家的移民经历，显然也丰富了他对于移民问题的内在深刻洞察。孔教授是美籍犹太裔，他的祖父母 19 世纪 40 年代分别从德国和奥地利移民美国，他的父亲虽出生于美国，却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而侨居英伦。孔飞力本人出生于伦敦，曾先后往返求学于英、美之间，最后执教于美国。孔飞力的弟弟库恩（David Kuhn）长期居住法国巴黎，孔飞力的儿子孔安（Anthony）曾经作为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多年侨居中国。还有，孔飞力的第一任妻子萨丽（Sally Cheng）是华人，第二任妻子玛丽（Mary L. Smith）曾经多年执教于老挝。显然，孔教授本人的移民体验和对周边亲人们移民经历的体察无不丰富了他对于移民之异域生存谋略、族群情感维系、国籍认同形塑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洞察。就民族属性而言，孔教授无疑是华侨华人社群的局外人，但就“移民”属性而言，孔教授则显然是“移民群体”的局内人。而且，族性上的局外人立场丝毫不影响孔教授基于多年日积月累的坚实学术功力，去深刻体谅局内人的喜怒哀乐，精准把握局内人的动态走向。如此“能入能出”，或曰，撬动移民边缘性杠杆以认知移民社会的特殊性，无疑是成就孔飞力这一部关于中国移民巨著的又一深刻原由。

总而言之，《他者中的华人》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 500 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专业学人领悟广博深远，令非专业读者感觉亲近熟悉。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 500 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他在开篇伊始就提出的重要观点：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是，海外华人研究自身也就从“边缘”被顺理成章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发展的大历史之中。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于厦门

【论 文】

明治时代日本的中国本部概念¹

陈 波²

摘要：本文研究明治时代日本学界从西方接受 China proper，译为“支那本部”加以展布的历史。文章梳理江户时代日文中“支那”用法的增多和意义的转变，至明治时代新概念“支那本部”的出现及诸种译法，伴随而来的是族性地理学的分类体系。日本学者据此对以前所持的华夷秩序观进行转换，继续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同时，对中国诸部重新分类，并逐渐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为日本扩张主义者利用，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支那本部”概念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不符，所以中国学者对之或加以批判、改造，或抛弃这一概念。

关键词：支那本部 族性地理分类体系 华夷秩序 代表性 中国观

¹ 本文刊发于《学术月刊》2016 年第 8 期。

² 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